

胡克：马克思主义还是实用主义

陈亚军

[提 要] 胡克在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受到不应有的冷漠和误解。本文通过历史的和学理的考察，表明在胡克那里，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胡克早期是要用实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本人胡克始终是深怀敬意的；他的转变有着诸多历史和理论的原因。

[关键词] 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 杜威 能动性

[中图分类号] B71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3)03-0139-07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胡克是一位悲剧性的人物。这位杜威“最出色的学生”，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不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毫无地位，而且在实用主义谱系中也鲜为人知。前者不难理解，因为胡克终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守住晚节；但后者就令人费解了，毕竟，胡克是戴着“实用主义者”的头衔告别人世的。从近来美国学术界的出版物看，此种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比如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费滕斯坦（Matthew Festenstein）的《实用主义和政治理论：从杜威到罗蒂》以及罗蒂的《建设我们的国家：二十世纪美国的左翼思想》都没有对胡克给予特别的关注。然而冷漠中也有例外，哈佛大学的著名新实用主义者维斯特就在他的《美国人的哲学逃避：实用主义谱系》中对胡克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粗线条的然却极具深度的分析。而更引人瞩目的还是菲普斯（Christopher Phelps）于1997年发表的《青年悉尼·胡克：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在这部著作中，菲普斯详细描述了胡克从马克思主义者走向实用主义者的思想历程，描述了青年胡克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与实践。它为我们了解胡克的思想转变，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①。

尽管胡克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大的转折^②，但明显可见的是，他的思想轨迹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因为在此之前，他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激情，捍卫马

克思主义是他思考问题的主要兴奋点，而在此之后，他决然地割断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脐带。虽然他对马克思本人的温情没有完全失去，但他对恩格斯之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极其失望，以至于在40年代初公开放弃了自己“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站在了右翼势力的一边。

胡克于1902年出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早年家境贫困，反抗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很早就 在胡克年幼的心灵中产生了共鸣。13岁之前，胡克已经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强烈震撼了胡克，在中学里，他发起组织了红黑党，是学校官员们眼里“制造麻烦的‘布尔什维克’”。大学入学伊始，他便参与组织了“社会问题俱乐部”。成员多为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生，他们一起讨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这期间，胡克还曾给他原先所推崇的罗素写信，对罗素从苏联归来后所发表的言论表示失望和不满。在胡克看来，罗素所谴责的社会革命对艺术和美的损害比起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战争所带来的损害，简直微不足道。

1928年至1929年，胡克前往德国、苏联。他旁听了柯尔施的讲座，后又入学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他是最早获准进入这一学院学习的西方学者之一。此时的胡克虽然已经受到杜威的很大影响，但仍然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他不仅帮助翻译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且还创立并领导了美国工人党（AWP）。

胡克很早就阅读过德文版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更多地受到上述两位的影响。他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堆真理的集合，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指导革命行动的辩证法。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民主与人道的特点，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差别、独特性、独立性以及创造的新颖性是被[马克思主义]鼓励和强调的内在价值；确实，反对资本主义的最强有力的论证之一是它阻碍这些价值的充分繁荣。”^③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胡克后来的背离马克思是因为他对实用主义的归依，马克思与实用主义似乎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从胡克的思想经历来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他在信奉实用主义之后的至少十多年间，仍然是一位坚定的、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

胡克2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接触到杜威，在此之前，他思想乐章中的最强音是马克思主义。但在胡克的眼里，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矛盾。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所运用的历史方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相互补充、并行不悖；杜威从劳动分工中追溯哲学二元论的根源，反对超时空的终极目标的设定，强调哲学与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注重实践的本体论地位，主张理论与行动的不可分离等，与马克思的相关思想都非常接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胡克反倒是对杜威的某些主张有所保留，而且即便在他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之后，他也不是和杜威没有分歧。在整个30年代，胡克对杜威的很多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胡克当时更多地倾向于卢卡奇等人的观点，将社会看作在历史中产生的整体，拒绝杜威的社会是由一个个经验事件构成的观点，认为“阶级不会通过实验来决定他们自己不存在的后果将是什么。”^④事实上，就是在胡克的晚年，在他彻底断绝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后，他也仍然没有和杜威“保持一致”。菲普斯注意到，胡克的“自由的形式主义”（liberal formalism）“和杜威的实验的以及彻底的民主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⑤

我们当然不能说，胡克40年代以后的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和实用主义完全无关，因为在如何看待社会进步，如何对待革命等问题上，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从理论的角度说，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存在着众多的重叠和相似。胡克的转向和实用主义没有直接关联，而他意识到实用主义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并自觉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批判马克

思主义，那已经是他完成思想转变之后的事情了。

胡克的转变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既有理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实践方面的原因，而社会实践方面的原因大于理论方面的原因。从理论的角度说，胡克自 20 年代起，受到科亨和杜威很大影响，前者的自然主义和后者的实用主义成了胡克的基本哲学信仰。在 30 年代之前，胡克一直想把这种自然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协调起来，用实践的人道主义诠释马克思主义。但逐渐地他发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并不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这或许导致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查，结果是：他看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自恩格斯以降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它的主要部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胡克原先以为的说服力。这也动摇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1947 年，胡克在谈到为何放弃马克思主义时说道：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的解释，它与关于他的基本学说的流行观点和理解相冲突，……假如我对马克思的意思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也许将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幽默感，因此我已经决定放弃用这个概念（指“马克思主义”——引注）作为我的立场的描述性称号。”^⑥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说，有两个因素值得一提。首先是 30 年代中后期苏联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所作所为，使胡克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派拒而远之。胡克很早就对斯大林主义不满，他同情托洛斯基，和美国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在行动上保持一致。随着二战的临近以及苏联与纳粹德国和约的签定，胡克对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愈加警惕，在社会实践方面与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越来越大。自 1938 年下半年开始，胡克公开批评苏联，同时也开始对托洛斯基仍然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分析苏联的做法产生怀疑。胡克四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矛头所指，主要是斯大林的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关，他也重新检讨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人的社会革命的思想，实用主义渐渐自觉地占了上风。对此，维斯特指出：“逐渐而又确定地，胡克的注意力从批判有缺陷的资本主义民主转向了捍卫一种‘不完善的’民主以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⑦其次，当时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对胡克构成了极大的压力。胡克曾经是位勇敢的马克思主义者，是 30 年代“美国唯一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院教授”^⑧，但在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美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越来越不利于左派，世界大战的逼近，左派的孤立，在学术界和公共媒体马克思主义空间的狭小，对胡克的心境冲击很大。胡克的政治热情开始减弱，革命在斗士形象逐渐被温文尔雅的教授形象所取代^⑨。

二

胡克早年对马克思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 30 年代所写的阐释马克思的著作《理解卡尔·马克思》（1933 年）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 年）曾被誉为“美国人关于马克思的最好的哲学著作。”^⑩然而从四十年代起，胡克陆续发表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 年）、《历史中的英雄》（1943 年）以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含糊的遗产》（1960 年），转而尖锐地诘难批判马克思主义。如果拿前期胡克和后期胡克相比，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别：前期胡克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信心，他站在人道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理解马克思，注意将马克思和正统派的关于马克思的解释甄别开来，捍卫他所喜爱的真正的马克思的哲学；而后期胡克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失去自信，他不仅更加具体地对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剧烈指责，而且也对马克思本人进行反思，指出

其不足，试图放弃马克思哲学，将它融入杜威的实用主义。

如果说30年代胡克对马克思的理解染有很浓的实用主义色彩的话，那么40年代的胡克，则要用实用主义的招牌替换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他已经懒于澄清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并多次提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建议：

“是不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就像这是不是‘马克思的真正意思’的问题一样，是不重要的。”^⑩

“这一派人的理论（指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引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忠实于马克思本人的意旨，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占优势的理论传统就是由他们来奠定的。”^⑪

“为了心理上和历史上的理由，也许有必要放弃‘马克思主义’一词，不用它来作为一种鉴定的名词。”^⑫

不过，应该公正地指出，胡克即使在放弃“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并对马克思的某些思想提出批评之后，对马克思本人也始终怀着崇敬的感情。他很少对马克思严厉指责，他的矛头所指主要还是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人。

“几乎每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思想家，都曾因为其拥有信徒而付出了代价。”^⑬胡克眼里的马克思尤其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的背叛如此昭然若揭，它已经完全失去了革命的批判精神而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由一个革命党蜕化为反对党。胡克对于这个党的义愤填膺的讨伐，我们打算在此多说，我们的关注点在于这样一个更具理论意味的问题，即：胡克如何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后继者之间的区别？他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列宁之间的分歧的？

胡克和卢卡其、柯尔施站在一边，将马克思主义首先理解为一种指导革命实践的价值理论，一种充分重视人的活动、人的参与的实践理论。胡克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在基本出发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人的需要、进化和活动”。杜威从达尔文进化论中所获得的启示是：哲学以及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都来源于人类与环境打交道的需要，是人类生存、进化的工具，它不仅有着具体的实践背景，而且渗透了人的价值、愿望；人从来就不是世界的旁观者，他一定是一个不断谋划、行动的当事人。胡克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杜威实用主义的出发点如出一辙，但和杜威不同的是，他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原则：“它（指马克思主义——引注）并不是一种学士椅中的怀古哲学，而是一种社会行动的哲学；更加具体地说，它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⑭那么，马克思的后继者们是如何改变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特征的呢？胡克的看法是：

“在他们阐释的基本特征中，都存在一种明确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不再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社会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而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科学了。官方的理论上的强调，包含有这样的意思，那就是：与其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创造历史的方法，还不如说是在历史已经被创造出来之后，理解它的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某种中性的和超越于价值判断的东西。……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来，它是客观的和科学的。它的威力不仅建立在权力上，而且建立在知识上。”^⑮

胡克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一篡改，使得原本在马克思那里极为重要的“人的活动”、人的能动性成了一种社会进步的可有可无的“多余的附加物”。一个朝气蓬勃的行动者的纲领就这

样变成了坐在扶手椅中的“秃顶博士们”手中的讲义。它的危害在于：社会主义成了一种科学论证的产物，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对于它的“一切反对和忠诚，都同样是无足轻重的。”“对马克思所作的这种纯客观主义解释，造成了这样一种使人麻痹的理论。”^{①7}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篡改？胡克从两个方面对此做出分析：首先是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十九世纪末，德国资本主义振兴，经济、社会相对稳定，随着海外市场的征服，贸易获得巨大利润，就业机会增加，工人工资提高，工会被收买，工会背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变质。他们虽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改良式的科学主张，认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乃是马克思所说的符合经济规律的铁的必然性，任何反对都是没有意义的乌托邦式的举动。对此，胡克指出：“政治事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压力，助长了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客观科学’这种现象的流行，只有那些为幻想和自私心蒙蔽了眼睛的人才不同意这种解释。”^{①8}

胡克认为，除上述社会政治原因之外，恩格斯也要为这种篡改负一定的责任。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胡克对于这一点的看法是：他们既不像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完全一致，也不像一些人所以为的那样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恩格斯确实对马克思作了一种“带有特征性的强调”，正是这种强调导致了影响深远的后果。据胡克的理解，《反杜林论》中已经开始用一种一元论体系的观点来对待形而上学、科学和伦理实践的争论；而更加重要的是，在恩格斯帮助整理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2、3卷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成了一种一般的科学理论“而不是革命批判方法的例证。”胡克指出：

“恩格斯在这样做的时候，就没有能够发挥马克思的关于‘商品拜物教’学说的
重要社会逻辑的和实践的含义。”^{①9}

“马克思没有把《资本论》设想成对客观的、自然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个推理性
阐释，而是看成一个自认为是客观的体系的批判的——社会学的和历史的——分析，这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②0}

与此相关，从哲学的角度说，胡克把马克思解释成与杜威相近的自然主义者，认为恩格斯偏离了这一方向，滑向了简单化的唯物主义的怀抱。和杜威批评近代认识论的腔调近似，胡克也倾向于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一种认识论：“在马克思那里，求助于实验和实践都是合法的，因为作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一个亲密的学生，他已经抛弃对认识的直接信仰了。”^{②1}胡克指出：“对马克思来说，感觉却是各种形式的实践的感性活动。它们并不是知识，而是在行动中使自己得到完成的、知识的刺激物。……观念就不能是消极的映象：它们必须是能动的工具。”^{②2}胡克对于马克思的诠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它的精神实质和实用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及奥斯汀等人否定感觉是认识论基础范畴的思想十分近似，即从人与世界的交互作用中理解感觉，不把它当作隔开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分界面”，而把它当作实践的方式之一，当作塑造世界、连通世界的纽带；它不是内在于人的心灵中的主观的观念，而是在进化中逐渐产生的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是一种实践的能力。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表述了此思想，但没有能被恩格斯所重视和发挥，相反，恩格斯的侧重点有了一种令胡克深感失望的变化：

“在其《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为了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
唯物主义基础，并没有充分地强调这个能动的实践因素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
和重要性。他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浅薄的公式，依据这个公式，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和

复写，而没有解释：如果观念只是一些反映，那么，它们又怎么可能有助于改造或革新事物。他不把感觉当作获得认识的重要线索，而把认识同感觉等同起来，并把真理定义为这些感觉同外部世界的符合。”^②

胡克承认，恩格斯并不是自觉地要和马克思分道扬镳，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或近似的，而且恩格斯也不是始终坚持上述简单的唯物主义主张的，事实上，在他的晚年作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言中，他又回到了马克思一边，放弃了原先的感觉论。然而许多恩格斯的继承者对此却视而不见。

和恩格斯相比，列宁更加充满了矛盾。在胡克的眼里，列宁的政治理论实践是对马克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早在1901年，列宁就已经反对那种以马克思主义作幌子的经济主义的变种。他在《怎么办》一书中明确指出，革命的政党不能等待经济发展进程的自发选择，不能作“尾巴主义者”；经济力量同革命组织，并不是像机械的原因与结果那样地彼此联系着的，它们是一个辩证的整体中的两个独立的因素，而一个辩证的整体则是不断地发展着的，它的各个部分也是彼此相互作用着的。轻视革命观念的效能，就是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牺牲品^③。胡克对此极为赞赏，认为列宁是“回到马克思并向前推进”了^④。然而，胡克认为，列宁的哲学却表现出一种极不和谐的音调，因为在他的哲学代表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提出了我们的感觉是物质的复写、摄影、反映的观点，它和上面恩格斯的主张一脉相承。为避免唯心主义，列宁牺牲了认识的能动性，这就使他的理论出现了致命的裂缝，因为在胡克看来：

“为了他的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社会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的概念，列宁就必须承认认识是一件能动的东西，是一个在其中存在着事物、文化和精神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而感觉则不是认识，而是认识同它一起发生作用的各种原料的组成部分。……谁要是认为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准确的复写并且本身就能产生认识，那他就不能够避免宿命论和机械论。”^⑤

胡克呼吁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列宁那些关于政治实践的著作，认为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找到列宁的真正的哲学。

三

胡克的思想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由于其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胡克被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凶险的敌人。而又由于胡克是杜威的学生，实用主义便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于是，胡克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批判尚且不够，更遑谈认真研究了。然而，胡克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正如尼古拉·卡帕第所说的：“胡克至少在别人之前30年就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连续性，更重要的则是理解、结合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新奇方式，产生出一种超越其源泉的、抗意识形态的混血哲学。”^⑥

综上所述，笔者的主要结论有两点：

第一，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胡克那里并非相互对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他既是实用主义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的最好的捍卫、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正是在他服膺实用主义时期完成的。他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饶有新意的诠释，在很多点上，和实用主义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诠释构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叙事，应该引起关注。他对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严肃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对此做出回应，而不是鄙夷。

第二,胡克在后期放弃马克思主义主要和两个原因相关:一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二是学术界流行的分析哲学的思维方式。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主要是对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满,鉴于这一派势力的过于强大,胡克失去了捍卫他眼里的“真正的马克思”的兴趣和信心。我们可以谴责他的软弱,但不能说他一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确实在后期也对马克思有所反思,但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绝少攻击。他不满足于马克思哲学的模糊性,竭力倡导哲学的精确性,这些显然和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的盛行不无关联。而随着他对于科学精确性要求的增强,他不仅放弃了对马克思的捍卫,同样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的实用主义声音。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受到强调,但实用主义在一些问题上的宏观姿态实际上被搁置起来。胡克当然坚持自己的实用主义旗帜,但他的实用主义和古典实用主义相比,科学味更加浓烈,这一点,在新实用主义者看来,是难以接受的,是对实用主义真谛的背叛。

鉴于此,胡克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和当代实用主义者那里所受到的双重冷漠也就不难理解了。由此,胡克成了思想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

①本文关于胡克思想转变的资料主要来自 Phelps 的这一著作。

②胡克在自传中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年轻时代以来经历了任何严重的转变,或抛弃了基本的信念。”(Sidney Hook: *Out of Step: An Unquiet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 P.596.)

③Sidney Hook: “Our Philosophers”, *Current History*, 41 (March 1935), p.703.

④⑤⑧⑨Christopher Phelps: “young Sidney Hook: Marxist and Pragmatis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04, p.236, p.51, p.119.

⑥Sidney Hook: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Partisan Review*, 14 (jan - Feb.1947), 25. 转引自 Cornel West: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A Genealogy of Pragmatis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p.118.

⑦⑩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A Genealogy of Pragmatis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 p.117.

⑪⑫⑬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

版社,1965年,第132页、第106~107页、第109~110页。

⑬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2页。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9页、第13页、第25页、第26~27页、第23~24页、第29页、第29页、第31页、第31页、第31页、第47页、第55页。

⑳《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21页。

㉘卡帕第:《悉尼·胡克个人画像》,载《悉尼胡克——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哲学家》,1983年巴法罗版,第18页。

作者简介:陈亚军,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福建厦门 361000

[责任编辑 刘慧玲]